

晚清学堂报刊职能的 演化与发展

卫玲 姚远

摘要: 报刊的教育职能表现在成为师资的替代、学堂切磋学术的重要媒介,以及荡涤闭关锁国、墨守成规、故步自封陋习和化一方风气的利器。始于清末的学堂内订阅报刊发展到自办机关刊物,作为学堂的重要附属和重要教育工具,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近代以来学堂既是产生知识的基地,也是传播知识的基地,从而创造了集研究、广育、报刊三位一体的崭新教育方式。

关键词: 学堂教育; 报刊; 清代末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XXW004)

作者简介: 卫玲,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姚远,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安 710069)

甲午以还,忧国之士深感教育在培植治国兴邦之才方面的重要作用,遂有废科举、兴学堂之举。然而,“今之入学堂者,半属旧之学生,今之办学务者,又多未受完全教育之人。无学问,无阅历,而又值学务万难之际,循是以往,恐不免有种种困难之现象”。在此背景下,办学者逐渐注意到报刊在兴学中的独特功能,意识到“游学他方,乃转运文明之正义,然需费浩繁,不能普及也;编译书籍,亦运转文明之捷法,然过劳披阅,恐难卒读也;荟萃焉,撷其精,分析焉,而语其详,事易行,而收效甚大者,举莫学报若也”。于是,兴学者先是订阅大量报刊,作为日课,组织学子阅读,进而自办刊物,辅助教学,及至确立了报刊在近世学堂中“何能舍此”的重要地位,成为清季所倡“研究”、“广育”、“报章”学务三端之一。这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及教育史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定为学子日课

光绪二十三年(1897),某御史“以现在各省士子,不知时事者,实繁有徒”,“因特具奏请飭各直省地方官,传谕各书院肄业诸生,均须将日报留心观览,以扩见闻,则异日身入仕途,当可一洗迂腐之习,不至于世故人情,茫无理会”。这是迄今所知通过政府将报刊阅读列入学校教育的最早记载。仅逾两月,即见求是书院订有《阅报章程》。该书院将院中学生分为3班,房分7间,每晚9点钟,10人一班,阅至10点钟止,再轮10人,以此递推,至12点归寝,所有报刊,亦按周一至周日,轮番分置于7间阅报室,轮流供各班次阅读。

成立于光绪二十九年的陕西课吏馆,将阅读报刊定为“日课”,以“开通风气,增长知识”。由

王世德:《关中学报序》,《关中学报》1906年第1期,第1—8页。

王世德:《关中学报序》,《关中学报》1906年第1期,第1—8页。

编者:《报章有益》,《集成报》1897年第3期,第161页。

蔡宝善:《课吏馆监督谕馆员阅报定为日课并作札记》,《秦中官报》1905年第3期,第5—6页。

于清末陕西僻处西陲,交通不便,延聘师资极为不易,甚至越洋赴日寻聘回的外籍教习,也长驻者寥寥。在这种情况下,以报刊为“师”,将阅读报刊和做札记定为日课,就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这种做法源自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讲学活动,他“劝人日读邸抄,以知朝局”。林则徐(1785—1850)抚粤时,也曾“使人翻译外报,以观夷情,通识美意”。因此,陕西课吏馆“洵堪师法,爰做成规,定为日课。谕令提调、分校等将各省官私报章,择其宗旨议论,无大纰缪者,购备多种,置之讲堂,仰肄业各员,于每日午后,均往披览。如有心得,随时作为札记,以觚达识”。

之所以将这些报刊作为日课,是因为它几乎包括了新学堂所要讲习的全部内容。比如:“农工有报,商业有报,政法有报,经济有报,有普通报,有专门报。要而言之,无事不有学,即无学不有报,无人不知学,即无人不阅报。”这些报刊:“上则朝章国政,下则里巷风谣,大而聘盟征伐,详列邦交,涉之机宜,细而格物致知,著欧美发明之新学,信足以开拓胸襟,浚涤尘垢。虽其间议论未尽精纯,传闻或多失实,然比之矇诵,既可为借鉴之资……住馆诸员,于历史掌故、政治、法律各门,亦既极深研……然根柢既茂,则枝叶宜剪,学力既深,则闻见宜扩。处今之世,断难墨守成规,自封故步。”这显然是将报刊视为了解世界和增识扩闻之窗,学习中学与西学的捷径,或荡涤“墨守成规,自封故步”陋习的工具。

为使这种教学方式制度化,课吏馆还颁布“阅报条规十则”:一是各项报章由收支处司事经理,凡新到日报、旬报,由该司事先送分校检察,后交讲堂;二是每日派听事一名,在阅报处轮流伺应,由司事督令打扫庭屋、整理几案、检点报章;三是阅报时刻,每日自午前十点钟起至午后五点钟止;四是阅报处借备书架一个,将各项报纸均置其上,诸君可任意取阅,阅毕仍还原处,以免散失;五是

每种报纸仅备一份,来阅者当以先后为次,幸勿凌越;六是诸君阅报,尽可携带纸笔,在讲堂择要抄录,惟不得将报纸带回号舍,并加涂乙;七是诸君批阅报章议论商榷,在所不禁,至喧哗笑谑则当深戒;八是各种日报均可装订,每十日由司事分类装订成册,按月送交藏书处存查;九是各种旬报每到一册即由司事登记置之书架,俟诸君阅后,每月检明册数,送交藏书处收存,以免遗失;十是各种报章原备馆员披阅,一切闲杂人等不得擅入,以肃馆规。从其阅报各规来看,将阅报融入教学已形成完善的制度。“诸君披阅报章议论商榷,在所不禁”,表明阅报气氛的活跃,“收支处”、“阅报处”之设和“按月送藏书处存查”等,表明报刊阅览、收藏和图书的阅览收藏,已渐成近代学堂教育的两大重要支撑条件。

二、作为演说师资

将报刊作为演说资料,最有影响者当属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的《湖南演说通俗报》(旬刊,每月3册,每期50页)。该报专载上谕电传、清官、新式枪炮、政治、时事、实业、湘中近事、中外大事等,文风以白话、通俗、浅显、易懂为特色,可直接作为白话演说词。长沙县沈县令称赞该刊:“律极精严,事尤赅备,大凡中外要政,以及本省近闻,所有关系地方土俗、民风,纤细靡遗,一概采入。士农工商阅之,固无不宜,且以俗话演说,据理论事,极为浅显,质之妇人孺子,尤易了然。若果家置一编,长幼传学,功由渐进,日新又新。诚劝学之始基也。”湖南醴陵县张县令不仅亲自于朔望日会齐同城文武在大堂演说报刊内容,还要求团务用公费订购《湖南演说通俗报》,组织“热心士子在乡演说,即以此为副本,更能按切地方情形为白话,随时宣谕,以助官府教化所不及”。

专设学堂演说报刊者当属光绪三十年河北宣化县阅报研究所附设的半日学堂。该学堂与阅报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82页。

沈大令:《通飭乡团购阅通俗报本手谕》,《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年第13期,第2—3页。

王世德:《关中学报序》,《关中学报》1906年第1期,第1—8页。

王世德:《关中学报序》,《关中学报》1906年第1期,第1—8页。

沈大令:《劝令乡团阅报谕帖》,《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年第8期,第1页。

研究所相辅而行,备有《农学报》、《启蒙画报》、《北洋官报》、《京话日报》、《徐家汇报》、北洋各种学报、白话丛书等几十种报刊,并“借阅报之名,以行演说之事,拈书报中紧要节目以阐发之”,而且“演说务使明白易晓,妇孺皆知”,“须以方言俗语为主”。演说又分为“小演说”和“大演说”。即“每日阅报,同人可轮日演说,此名小演说”;后者即“每月宜请官长,或朔望日,或三、八、五、十日临所,仿学政讲书例,于同人指定一人出场开演,如说平书者然,此名大演说,或曰演说会”。宣化县令称他在半日学堂的演说中,允许“质疑问难”,甚至可“厉声”发问,但他自己“总以和容悦色答之,要而言之,是劝人,非教人也。守此宗旨,不患无引人入胜之地”。今可考1904年该学堂有31名学生;演说员有王吉士、陈化新、马进元、郝汝霖等;演说稿抄写者有徐缙、郭登堂、冯继光、许发荣、闪宝贤、徐缓、郝汝霖、胡义浩等。

光绪三十一年,河北省城保定也设立阅报处,其宗旨即为“专以输入文明,开发知识为主”,“学堂教育一时未能普及,多一阅报人,即多一晓事人,知识普及,莫此为要”。由此可见,阅读报刊已成为学堂教育的一种辅助或补充形式。

直隶督宪袁某在《束鹿县创设研究时政馆请立案禀》的批示中称:“教育家谓,学校教育不如社会教育之普及,欲改良社会非演说不为功。”基于“民安于固陋,狃于积习,迄今知识未开”,“时局之危险,国步之艰难,外患之凭陵,内政之积弱,一似毫无见闻,漠不关心”。宣化县令也称:“演说一事,最足以发人深省”,故特呈文直隶督宪,请求在师范学堂内添立阅报演说一班。督宪袁某批示:“该县师范学堂应添立阅报演说一课,使师生皆洞悉中外情事。以后,散处四乡,广兴演说。”可按照天津宣讲所办法,以为社会教育之基”,并要求直隶学务处“通飭各州县一体仿照办理”。

杜亚泉有着丰富的教学、办刊实践,尤为重视科学演说。他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理科教习,也曾主编《亚泉杂志》、《普通学报》、《东方杂志》等刊。他“于修业之暇,携器具药品赴市场名胜大众聚集之所,演说试验……借为开通风气之助”。他发表在《亚泉杂志》第9册第2至4页的《论物质之溶和》,其实就是他“承各学会诸君之邀,在幼徒会会所内演说化学”时的演讲稿,听讲者“就演试之事记录而得”,故行文“不免凌杂耳”。这里,杜亚泉将西方的科学演说形式引入我国,并将演说稿发表于科学杂志,这无论从科学交流传播方式的创造上来看,还是从科学杂志创新稿源体裁上来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集研、育、刊三位于一体

学堂的学术研究职能,以及期刊作为学术研究的总汇,在清季已有初步的认识。就连清季中等学堂的监督韩忠也认为:“遵查学务之要约有三端:一曰研究,二曰广育,三曰报章。”

“各学堂创办未久,一切管理、教授诸法未必完全无缺,非借研究无以臻于完备”,而“报章”即报刊。如以“研究、阅报二事,整顿学堂,改良私塾,兼阅《北洋官报》、《汇报》、《大公报》、《北京报》、《中外日报》、《官话北京报》,以赞观感,而广见闻”,“讲究各种科学,力救其弊,以化迂腐”。研究、广育、报刊,“此三者固宜次第举行,渐求进化,尤须相辅而行乃收实效”。“三者缺一不可”。关于报刊与学术交流的关系,清季陕西办学也有独特的认识:“一新法之出,朝甫脱稿,夕已印行,朝出伦敦,夕已入巴黎,不数日,而各国学士文人皆持有其国之译本,相与探讨,相与研究,相与证明,相与辩论,有所缺则相与增补之,有所误则

编者:《宣化县呈送阅报研究所暨附设半日学堂章程折》,《教育杂志》1904年第2期,第12—14页。

编者:《保定阅报处简章》,《教育杂志》1905年第9期,第60页。

束鹿县:《创设研究时政馆请立案禀》,《教育杂志》1905年第11期,第26—27页。

宣化县:《请于师范堂内添立讲究阅报演说一班禀并批》,《教育杂志》1905年第12期,第15—16页。

杜亚泉:《化学奇观》,《亚泉杂志》1900年第3期,第7—11页。

杜亚泉:《论物质之溶和》,《亚泉杂志》1901年第3期,第2—4页。

河间府:《详中学堂监督禀请设广育学会参附研究阅报文并批》,《教育杂志》1905年第10期,第9—10页。

河间府:《详中学堂监督禀请设广育学会参附研究阅报文并批》,《教育杂志》1905年第10期,第9—10页。

相与纠正之,是学术上之大合会,是学术上之大竞争。其促进文明之力,非常伟大,骎骎乎遍及于全球也。”并且认为,我们正由“一哄之时代,进于研究之时代”,而“一哄时代之学术、之报章,研究之时代,亦当有研究时代之学术、之报章”。

这些是有关清季旧学改良最适时、最精当的一些论述,比较符合当时新学乍兴、旧学犹存的交会态势。从这点上看来,报刊的社会功能和学堂的社会功能,在输入文明、开发知识、启迪民智、教化民风 and 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功能,可谓异曲同工。这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堂将报刊奉为教育至宝和社会仁人志士将报刊视为劝学始基的原因,以致有“得教育人才,必先劝学,开通民智,须阅报章”,以及“登高行远存乎其人,化导愚民何能舍此”的说法。有的甚至将报刊的社会功用夸大至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地位,认为报刊“举器器然曰:八股可废,不数年而八股废矣。又器器然曰:科举宜停,不数年而科举停矣。迄于今,学堂已开,学章已布,学官已定,学部已设,通国上下,究心学务……新闻杂志之发行,亦且愈出愈多,文明气运,郁积旁薄”。在这里,报刊已几乎成为清季学务兴盛的发动机,又似学务兴衰的大判官,让谁兴谁就兴,让谁亡谁就必死无疑。

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的陕西课吏馆,可谓集研究、广育、报刊三位一体的典范。光绪二十九年七月(1903年9月),该学堂创办了西部地区最早的学堂刊物——《秦中官报》,并将刊物用于教学;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该学堂创设了西部地区第一个研究所——自治研究所,从而使学堂的“研究”职能得以凸显。创办《秦中官报》的目的是要使“在学人员能明了本省情况和中外时局,以增广见闻”,也是为了将学堂由对在学人员教育拓展到社会教育,即提出了“培植官吏蔚为通博之才”,“启迪绅民养成识时之俊”的办刊宗旨。办自治研究所、招所内“研究生”和招在职“所外研究生”的目的是“改良吏治,培养佐理新政人才”,“养通才

而资深造”,其具体的攻读方向就是以自治立宪为基础的地方自治研究。这无疑强化了学堂的学术研究职能,同时也拓展了报刊的社会功能。

这时的学生由受教育者而利用办刊转换身份,成为集研究者、社会教育者和办刊者三位一体的现象,也颇具时代特色。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学生张家集(用三)、贺澄源(念庵)、梁思钰(绾相)等,就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人物。他们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两种学堂农学期刊之一——《北直农话报》(另有湖北农务学堂1901年创办的《农学报》)。该刊集农学学术研究与通俗普及性为一体,既设有病虫害学、土壤学、农艺化学、肥料学、作物学、气象学、园艺学、植物病理学、格致和算数等学术含量很高的栏目,并采取连载的方式介绍农学和与之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凸显了这所华北农业最高学府的学术研究成就,达到“研究”的目的。同时,又辟有博物、农学小说、谈丛、纪事等专门传播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栏目,由此将学校教育扩展向社会教育,达到“报章”和“广育”相辅而行的目的。《北直农话报》甚至被督宪、布政司等“通飭各属,分别订购,用为演讲之资,并移该堂(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知照,照禀抄发报章”(即《北直农话报简章》),获得了与官报发行相同的待遇,令各地“仿照《北洋官报》办法,视各属缺份之大小,以定份数之多寡”。

创设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的我国近代第一所中医学校——浙江瑞安利济医学堂也是这样一所集中医学术研究、中医教育和办刊三位一体的学堂。其《利济学堂报》半月刊(1897年创刊)的办刊宗旨为推广发扬中医事业,兼介绍中西一切学术,提倡学术争鸣,冀此力图富国强民。其装订颇为独特,各期专栏的稿件,可按读者不同兴趣,按分折线再次装订汇编为不同的专集。刊物发行全国,在港澳亦设有发行处。其所载学术论著有不少即为本堂教习所撰的讲义,也有选自他刊或新撰的颇有创见的中医论著,在开启医学学术风气和培

王世德:《关中学报序》,《关中学报》1906年第1期,第1—8页。

沈大令:《通飭乡团购阅通俗报本手谕》,《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年第13期,第2—3页。

沈大令:《通飭乡团购阅通俗报本手谕》,《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年第13期,第2—3页。

陕西法政学堂:《附设自治研究所章程》,《陕西官报》1909年第2期,第1—6页。

平山县衙:《申请续发农话报申文》,《北直农话报》1906年第11期,第25—26页。

养中医学术研究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启示与结论

过去人们多关注于报刊通过舆论宣传,鼓动革命的作用,而忽视了报刊在传播知识、养成学术人才的社会教育职能,学校所办报刊,似乎也渐忽视这种职能。从清季学堂教育历史来看,报刊的教育职能表现在:一是成为师资的替代,特别是在留学或聘外国教习经费浩繁和本国教习多系不擅长新学的旧日进士、举人、秀才的情况下,成为一种廉价的应急教习;二是由于“无学不有报”和迅捷的学术信息交流功能,使报刊成为学堂切磋学术的重要媒介;三是成为荡涤闭关锁国、墨守成规、故步自封陋习和化一方风气的利器,使学生借此了解国内外大事,增长时政知识,开阔眼界,形成新的世界观。

始于清末的学堂由订阅报刊发展到自办机关刊物,作为学堂的重要附属和重要教育工具,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师生通过办刊,发表各种学术见解、思想、方法和新技术,既交流和传播了知识,又

在实践中掌握了期刊编辑出版的一种技能,更重要的是成为学堂与社会间的一座桥梁。从教育的角度讲,学堂通过期刊,大大拓展和延伸了其教育范围,即由学堂教育发展到社会教育;从期刊角度讲,新闻出版事业在学堂生根,从而构成了学术期刊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了专门研究机构、学术社团这三大最基本的学术信息生产和出版群体或格局。

近代以来,学堂既是产生知识的基地,也是传播知识的基地,故最易接受期刊这种新形式作为通达社会的桥梁,从而创造了集研究、广育、报刊三位一体的崭新教育方式。民国初年执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通过广揽学术人才、兴办学术社团、创办学术期刊,力图把大学办成“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从而将高等学校应具有教育、研究两大职能的思想,和重视办好期刊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也由此奠定了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学校体制。这一切,均源于清末学堂时代先贤们的追求和探索。

(责任编辑:匡云)

征 稿

《历史学家茶座》是一本定位为“轻松、休闲、高雅;有识、有趣、有用”,面向知识大众的通俗历史文化读物。

《历史学家茶座》欢迎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也欢迎普通的历史爱好者来此品茶论道。

根据本书定位,《历史学家茶座》的稿件要求如下:

1. 内容上,可以谈人物,可以论事件,可钩历史之沉,可宣一家之言,可立足九州说风土,可放眼域外讲新声,以历史文化为大背景,做出真、善、美小文章。
2. 风格上,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活泼有趣,雅致隽永。

稿件字数:5 000 左右。稿件一经采用,按照千字 100 元支付稿酬。

联系地址: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山东人民出版社《历史学家茶座》编辑部(250001)

联系电话:0531-82098901 投稿邮箱:lishixuejiachazuo @126.com